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25 期

主办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基地
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智库
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吴振磊

主编

李浩

执行主编

赵杭 王早娟

责任编辑

陈战峰 刘晓宇

刘晓 王晨佳

郭琳 肖潇

刘睿

封面题字

袁行霈

◆工作简讯

李浩教授主编教材荣获研究生教育教材特等奖 12

李浩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学术讲座 13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致信西北大学

感谢李浩教授 14

唐代文学学术集刊暨精品期刊建设专题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15

《唐代文学研究》被评为“2022 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 AMI 综合评价”核心集刊 17

◆专家观点

陶文鹏 论辛弃疾词的象征意象和灵境 18

方铭 运河、漕运与古代中国

——《读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 122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 124

◆学者风采

游诗词之碧海,探瑰奇之骊珠——陶文鹏研究员访谈录 126

◆新书推介

《唐宋诗词艺术研究》 139

《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 140

李浩教授主编教材荣获研究生教育教材特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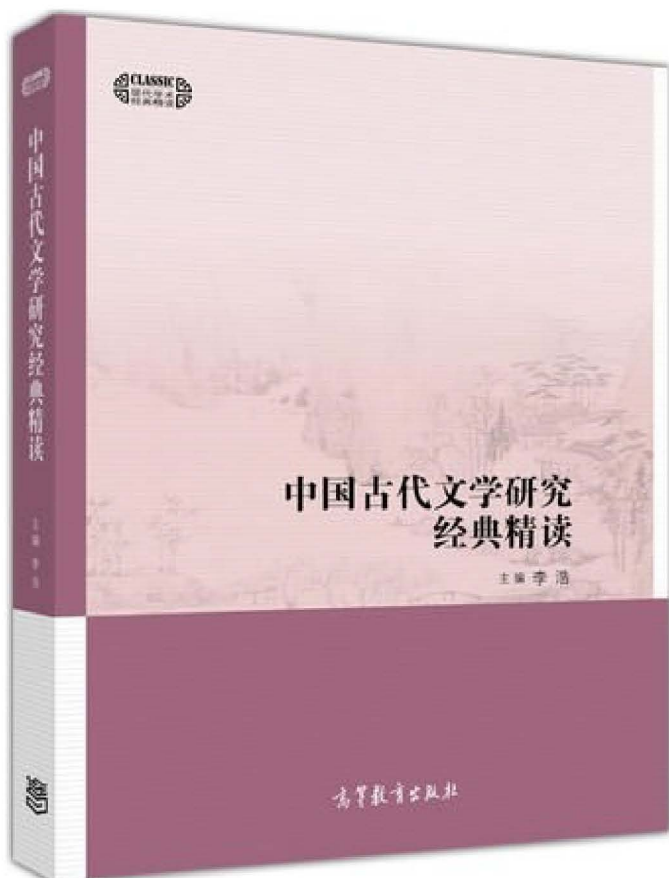
2023年2月13日,陕西省教育厅公布2022年高等教育优秀教材获奖名单,由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典精读》荣获2022年研究生教育类教材特等奖。

作为“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之一,本书以开放的视角和批判性思维,集中选编了20世纪中国本土及海外汉学研究者在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并加以细致导读。选文遵循广选、精选的原则,对晚清、民国、新中国等不同时段以及国内、海外等不同地域的研究成果兼收并蓄,同时涵摄诗、词、曲、文章、戏曲、小说等古代重要的代表性文体,在此基础上,精心收录具有方法论意义、足以体现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高成就的著名论著。导读部分主要介绍选文作者的学术经历、时代背景以及选

文所涉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学术旨趣与价值取向等,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呈现促成某部经典论著的诸多因素,使初学者能够取法乎上,清晰地窥见治学门径,通过自觉地借鉴、模仿,走上学术研究的正途。后附延伸阅读文献篇目,使本书具有提纲挈领、扩展延伸的双重功能。

研读经典是严格的学术训练的需要,也是提高学术入门者的学术鉴别能力和学术素养的必经途径。本教材目前已印至第二版,被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也是其它不少院校研究生及本科生教育的重要参考读物,有力支撑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活动,获得了师生的广泛好评。



李浩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学术讲座



3月16日下午,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摩石·研石·护石——新见唐代石刻文献研究的成绩、瓶颈与未来展望”的讲座。本次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康震主持讲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桂萍、副教授谢琰作为与谈人与李浩教授就讲座内容展开了对谈。

李浩教授在讲座中叙述了自己近年来专注于唐代石刻文献研究的缘由,介绍了已刊和待刊的诸多研究成果,并分享了研究心得。当谈及自己逐渐成为一位“好石之徒”的原因时,李浩教授提到了双重学术传统的影响,一是学界鼓励以新史料文献“预流”学术的大传统,二是西北大学文史研究自有的陈直学派的小传统。之后,李浩教授通过展示大量学界已有的石刻文献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传统金石学正在历经剧变,需要全面继承,更需要锐意创新。

同时,李浩教授也深度反思了出土文献研究目前的瓶颈与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开拓与展望。一是出土新材料的“井喷”式出现也意味着资

源即将衰竭,因此文学研究者更应抢抓机遇,以自己的学术优势跻身新文献的整理研究;二是文学研究者需要跳出原子化生存和工蜂化生产,横向打通其他学科的学术圈;三是目前出土文献材料的管理较为封闭,应倡导考古发掘的科学生态伦理,努力建设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的开放共享;四是文史学人要力争从新文献材料流水线的下游走到上游,尽可能参与了解文献出土的全过程;五是大多文学研究者常局限在书房和文本中,文史学人应积极参与田野勘测和现地考察,尽可能提取包含文字在内的丰富全息信息。

谢琰副教授细致分享了自己研读李浩教授诸多学术成果后的心得:每一方墓志本身就是一个小的生态圈,李浩教授通过结合多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石刻材料进行解码式研究,可补充还原研究对象背后的复杂社会关系,为出土文献的考据研究找到合适的文学出口。

杜桂萍教授通过介绍李浩教授的新作《摩石录》,指出文学、史学与金石学的交叉研究是当今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认为李浩教授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出其学者气质与作家心性的有机结合,展现出浓厚的文学使命感。

康震教授总结说,李浩教授极具学者敏锐度,总是能及时抓住学术前沿问题,做“考”与“论”双管齐下的研究。另外指出,文史研究者既要充分熟悉已有传世文献,也要敢于使用新出土的研究材料,做到从“考”入手,由“论”而出。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致信西北大学感谢李浩教授

日前,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给西北大学发来感谢信,对我中心主任李浩教授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智能平台开设的“诗词艺术古今谈”约书群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今后进一步和西北大学加强合作,共同为建设书香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推动委员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建设“书香政协”,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政协的一项重要指示,也是十三届全国政协的重要实践创新。

2022年2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智能平台开设“委员自约书群”。作为委员读书活动的一项创新探索,自约书群最大特色是为有共同兴趣的委员提供个性化读书交流平台。

2022年7月31日,“诗词艺术古今谈”政协委员自约书群成立。“诗词艺术古今谈”定期邀请国内文学领域优秀的前沿学者入群讲座,这些学者在诗词教学和研究领域深耕超过20年,造诣深厚。2022年8月,“诗词艺术古今谈”自约书群邀请了我中心李浩教授担任导读专家,围绕“唐诗的艺术奥秘”作专题讲座,并与全国政协委员一起在线交流研讨。期间,李浩教授认真备课、精心准备,撰写了高水平的导读文稿,取得了

良好的交流效果,受到全国政协委员关注和好评,有力推动了全国政协委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为委员更好地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提供了智力支持。

李浩教授本次导读文稿在《人民政协报》(2022年08月15日第11版)全文刊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感谢信

西北大学:

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推动委员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政协的一项重要指示,也是十三届全国政协的重要实践创新。深入学习古典诗词艺术,深入思考古典诗词教育的当代价值,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根据工作安排,“诗词艺术古今谈”自约书群,邀请贵校文学院李浩教授担任导读专家,围绕“唐诗的艺术奥秘”作专题讲座,并与全国政协委员一起在线交流研讨。期间,李浩教授认真备课、精心准备,撰写了高水平的导读文稿,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效果,受到全国政协委员关注和好评,有力推动了全国政协委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为委员更好地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此,向李浩教授的辛勤付出和贵校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为建设书香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1月22日
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6191707 66191172

唐代文学学术集刊 暨精品期刊建设专题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3月3日至5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西北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唐代文学秘书处和西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唐代文学学术集刊暨精品期刊建设专题研讨会”在西安隆重召开。来自中华书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如何建设精品期刊展开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长李芳民教授主持。西北大学赖绍聪副校长,西北大学文学院杨遇青副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詹福瑞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兼人文分社宋月华社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赖绍聪在讲话中说,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是高水平大学必须具备的学术平台,优秀的学术期刊可以与学校里人文社科专业发展相互促进,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有紧跟时代步伐,将学术理论上的创新与社会实践相契合。西北大学现已办有《唐代文学研究》《中东研究》《西部考古》《中国思想史研究》等一批在学术界已经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更好地提升这些期刊的办刊水平。

杨遇青回顾了建校120年来文学院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光辉成就。他说,文学院一直重视

学术期刊建设,历史上的《唐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年刊》在全国都曾拥有重要的影响力。文学院现有《唐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辑刊》《贾平凹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文摘》等四个期刊,这些期刊在学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覆盖集刊与文摘、古典与现代的期刊集群。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文学院的期刊建设。

詹福瑞指出,本次会议的召开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唐代文学学会和《唐代文学研究》杂志是自己一直以来都很重视的学会和期刊。西北大学是唐代文学学会的发祥地,第一次全国唐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就在这里召开,西北大学为唐代文学学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现任学会会长李浩教授身荷重担、心存高远,对学会和会刊的建设做出了重要探索。本次会议的召开有望达到预先期待。

宋月华在讲话中说,社科文献出版社与西北大学之间已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唐代文化中的唐代文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相信依托西北大学文学院和唐代文学学会,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定能够更好地为唐代文学研究服务,为当下社会文化发展服务,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学术发展做好宣传推广和出版发表工作。

李浩向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向西

北大学对唐代文学学会及学会刊物建设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学会会刊主要用来配合学术年会、保存学会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时代在变化,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日益影响生活和学术,学会期刊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大众搭建高端平台,推出优秀成果,给所有学人提出了切实问题。热切期盼与会专家传经送宝,把脉唐代文学学会两个刊物的发展,探究出学术期刊如何推出原创性成果,如何服务未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领域做出无愧于

时代成果的好做法。

本次会议共举行了三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建设高水平期刊建言献策,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由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唐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李芳民做总结发言。李芳民对本次研讨会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赞扬,他认为,本次会议虽然时间紧凑但研讨内容充实,与会人员高论迭出,相信这些高论一定能够很好地促进西北大学《唐代文学研究》等刊物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文学研究》被评为“2022年度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集刊

2023年3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的第十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高峰论坛暨期刊评价报告发布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并正式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年)》,《唐代文学研究》获评核心集刊。

本次评价采用《集刊AMI评价指标体系(2022)》,对403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进行了评价。主要依据吸引力、管理力、影响力这三个一级指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评出87种核心集刊和316种入库集刊。其

中,文学学科集刊共评出49种,核心集刊11种,入库集刊38种。《唐代文学研究》被列为核心集刊之一。

《唐代文学研究》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刊,由学会和西北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自1981年创刊至今,《唐代文学研究》(包括其前身《唐代文学》及《唐代文学论丛》)刊布了千余篇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已成为代表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水平并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一级学会会刊。



论辛弃疾词的象征意象和灵境

陶文鹏

摘要:南宋伟大词人辛弃疾是写作比兴象征词较早,并且写得最多最好的。他的比兴象征词多以表现其抗金救国壮志与壮志未酬的悲愤为主题,其题材内容、体调风格丰富多彩。他熟练地运用“想象出象”“借典造象”“即景取象”等多种方法,创造真切、鲜活、多样的象征意象,从而营构出极具雄奇性、戏剧性、层深性的象征灵境。其象征词的比兴寄托“不伤崭露,不易指陈”,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开放性,多篇作品成为古今传诵的经典,对于元明清比兴象征词的发展和清代周济等人“寄托说”“词史说”理论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辛弃疾词;比兴寄托;象征意象;象征灵境

近三年来,我经常阅读辛弃疾词,撰写了几篇论文。在研究辛词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稼轩的比兴寄托亦即象征词在南宋词人中数量最多,思想艺术水平也最高。其中不少篇章堪称中国古代词史的经典之作,例如《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满江红·暮春》《祝英台近·晚春》《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贺新郎·赋琵琶》《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青玉案·元夕》《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于是,就想写一篇探讨稼轩比兴象征词的文章。

什么是象征?它是来自西方的诗学概念,是诗歌写作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19世纪80年

代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斯特芳·马拉美指出,象征就是“暗示”和“隐语”^①。正如钱锺书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②中国的诗论家很早就把象征与比兴寄托看作名称不同实质一样的诗歌艺术手法。梁启超认为象征就是“把所感的对象隐藏过去,另外拿一种事物来做象征”,又说:“三百篇的作家没有象征派,然而三百篇久已作象征的应用。纯象征派之成立,起自楚辞。篇中许多美人芳草,纯属代数上的符号,他意思别有所指。”^③其后,梁宗岱说:“所谓象征是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④,而“最幽玄最缥缈的灵境要借最鲜明最具体的意象表现出

①伍蠡甫、蒋孔阳编:《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62页。

②钱锺书:《谈艺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③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洪治纲主编:《梁启超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④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9-70页。

来。”^①梁先生融会贯通中西诗学,给象征下了精切的定义,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象征意象和象征灵境这两个概念,推进了中国诗坛对象征的研究和运用。

巩本栋在《辛弃疾评传》中,专设“以文为词兼用比兴:辛词的艺术特征之一”章节,指出辛词突出地运用了比兴寄托的艺术表现手法,颇具卓识^②。但因“评传”文体与篇幅所限,其论辛词的比兴寄托,仅寥寥数百字,过于简略。笔者检阅已有辛词研究目录,也未看到专论其比兴寄托的论题。为此,笔者撰写此文,拟从象征意象的真切性、鲜活性、多样性,象征灵境的雄奇性、戏剧性、层深性,象征词篇的多义性、歧义性、开放性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象征意象的真切性、鲜活性、多样性

辛弃疾约有数十首比兴象征词,长调、中调与小令兼备,题材内容宽广,艺术风格更是多姿多彩。这些象征词都营造出幽玄缥缈的象征灵境,其中蕴含着丰富深邃的情思,能引人入胜并动人心弦,更能发人感悟深思,这都得力于英雄词人辛弃疾感情充沛,感觉敏锐,观察细致,想象非凡,有灵巧的艺术手腕和强大的创新气魄。他在每首象征词中都能描绘出一两个或一连串具体真切、生动鲜活、饱含情意的比兴象征意象。我们先看咏物词《瑞鹤仙·赋梅》:

雁霜寒透幕。正护月云轻,嫩冰犹薄。

溪奁照梳掠。想含香弄粉,艳妆难学。玉肌瘦弱。更重重、龙绡衬著。倚东风一笑,嫣然转盼,万花羞落。寂寞。家山何在,雪后园林,水边楼阁。瑶池旧约。鳞鸿更,仗谁托。粉蝶儿只解,寻桃觅柳,开遍南枝未觉。但伤心、冷落黄昏,数声画角。^③

稼轩巧妙地综合运用比喻、拟人、烘托、反衬等修辞手段,在描绘这一株梅花中注入了深挚的同情与怜爱。梅花在园林楼阁被弃置到野地溪头。她曾与天上瑶池有旧约,而今却无人传信;就连粉蝶儿也只顾寻桃觅柳,却对她不屑一顾。词人表现梅花以溪水为镜奁梳妆。在月光下,她宛若一个穿着鲛绡的仙姝独舞。“倚东风”三句,创造性地化用《诗经·卫风·硕人》和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词句,活画出梅花秋波流转、嫣然一笑的神情意态,可谓“化美为媚。媚就是在动态中的美”^④。结韵再推出梅花在冷落黄昏数声画角中伤心的情景。全篇并无一字涉及政治与人生,但读者在梅花的遭遇中自然联想到作者被南宋朝廷冷落,受当权的主和派攻击弹劾,报国无门、知音难觅的孤独痛苦,感到梅花就是稼轩自我的象征。作者成功地刻画了梅花这一有性灵、有情思的象征意象,从而展现出一个要眇幽怨、深婉沉挚的象征灵境,强烈地扣响了读者的心弦。

咏物词基本上是每篇咏一物,篇中所写到的

①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第91页。

②巩本栋:《辛弃疾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2—243页。

③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95页。本文所引辛词皆出此书,不再一一注出。

④[德]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1页。

多种物象，都是为了衬托词题所标明的中心物象。辛弃疾诸多咏物词名篇，如《贺新郎·赋水仙》《贺新郎·赋海棠》《贺新郎·赋琵琶》《水龙吟·题瓢泉》《临江仙·探梅》等，都是塑造一个有性灵的象征意象从而营构出象征灵境的佳作。吴则夷说：“稼轩咏物，必有寄托。已开姜白石、王碧山之风。”^①指出稼轩比兴寄托的咏物词开启了姜夔、王沂孙咏物词创作的风气，可谓卓见。但他说“必有”，过于绝对；如说“多有”，则符合实际。

在稼轩的伤春怀人词中，也有不少比兴寄托的佳篇。《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古今传诵，词云：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
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词上片生动地描写几番风雨，花残叶败，落红无数；天涯海角，芳草萋萋，使春天迷失了归路。作者以这一系列真切生动的暮春衰残景象，层层深入地抒发伤春、惜春、留春、怨春的感情，暗示他对南宋国势忧心如焚。

而画檐蛛网、殷勤粘絮，也隐喻爱国志士欲挽救政局力不从心。下片由伤春所触发的“美人迟暮”拓展为“美人遭妒”。作者以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自喻，怒斥赵飞燕、杨玉环为争得君王专宠谗害他人，喻指当权小人千方百计阻挠抗金复国大业，表达他请缨无路虚度年华的悲愤。结韵描绘斜阳惨淡，烟柳迷蒙，危栏欲坠，正是行将坍塌的南宋小朝廷的象征。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评云：“此词所写身世之感极深。”“观结尾之意，可知所惜之春非止一身之遭遇，实乃身、世双关。此词颇似屈子《离骚》。盖谗谄害明，贤人失志，为古今所同慨也。”^②缪钺评析说：“通篇皆用含蓄之笔，比兴之法，虽伤国事，抒壮怀，而所借以发抒者，如惜春之情，如落红，如芳草，如画檐蛛网，如男女幽怨，如斜阳烟柳，皆极美之意象。悲愤沉郁之情，映以凄美之光，遂成异采。既非仅豪壮之呼号，亦非只儿女之怨慕。此稼轩独创之境界，以前词人所未有也。”^③评赞精切。

在辛弃疾的赠别会友词中，也有一些妙用比兴象征手法融入家国情怀和人生哲理的佳作，例如《鹧鸪天·送人》：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
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今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作者劝勉远行友人保重身体，努力加餐，少想功

①辛弃疾著，吴则夷选注：《辛弃疾词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②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535-536页。

③缪钺：《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6页。

名余事。但细细品味,这是反语,其中透露出他不能为国杀敌立功的愤懑。对仗工致的写景联,展现出一幅寥远、阴沉、迷茫的山水图画,渗透了凄凉的行色与忧伤的别情。下片推进一层,抒写比离合更大更深的人生悲欢。而言外之意仍然是能否实现杀敌救国的壮志抱负。结尾写人间行路,比江上风波更为惊险,既蕴含哲理,又隐喻抗金大业因被投降派阻挠而困难重重。在送行题材的小词中表现出如此重大深邃的意蕴,可见稼轩运用比兴象征的高明。

古代不少诗人和词家喜欢写节令诗词,藉以表现民情风俗、节日欢乐,或抒发乡愁与岁月流逝之感。辛弃疾也有一些节令词,运用比兴象征,在写节令中倾吐国恨乡愁,诗情感人,寓意深长。《汉宫春·立春日》词云: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
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
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
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
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
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据邓广铭考证,此词作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稼轩寓居京口,年24岁,已结婚安家。这是他南归以后的第一首词作^①。全篇紧扣着立春日的见闻感受来写,却又暗用比兴象征手法,使节物风光带有更深更大的寓意。上片起韵写春回大地,妇女们头

上装饰的春幡随风袅袅飘舞,但寒风冷雨,却要阻挡春天的脚步。词人料想那去年秋社时南来的燕子,今夜里一定会梦回北方故国的“西园”吧?于是,这只南来的小燕子,就成了词人思念故国的象征。由于思念故国,词人已无心去备办春日应有的黄柑腊酒、青韭春盘了。下片写他取笑东风忙着薰梅染柳,从此不得清闲;即使偶尔清闲,也不过是把他在镜中的朱颜换成衰老之颜。这两句饱含着词人对于岁月流逝、人生易老、壮志成空的悲哀。其后,词人妙用《战国策·齐策》的典故,表达他的家国愁恨,就像是玉连环一样无法解开。结尾写到暮春,他怕见花开花落,更怕见大雁北归而自己不能北归。明代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卷下评此词:“无迹有象,无象有思,精于观化者。”^②此词中的“无端风雨”“梦到西园”之燕、“北还”的塞雁等意象,都被作者以其未能抗金北伐的痛苦情意渗透而带了象征性,共同营造出一个蕴藉深婉的象征灵境,既感动人心又发人深省。

辛弃疾的怀古咏史词如《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篇,都巧妙地从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中提炼出生动的情节、场景和传神的言语、动作细节,使李广、孙权、刘裕等英豪和诗人陶渊明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实,稼轩是借古讽今,用比兴寄托手法,以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以古代英豪激发自己的报国壮志,抒写不能征战沙场的悲愤。这些怀古咏史词也带着浓厚的象征色彩。《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就是境界雄阔、涵义深沉、富于象征的杰作,词曰:

^①邓广铭校笺:《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页。

^②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628页。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
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
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嘉泰四年(1204)春至开禧元年(1205)夏，辛弃疾65到66岁，任镇江知府，此词即作于任上。距其辞世仅二年多。词人登上城楼尘表亭，眺望着即将西沉的红日和依然白浪滚滚东流的大江，不禁想到远古英雄大禹，他胼手胝足，孜孜矻矻，治理了滔天洪水，使鱼入深渊，人归平土，神州大地，免于陆沉，子孙万代，平安幸福。结尾二句，表达词人怀念和颂扬大禹的丰功伟绩，他要以大禹为榜样，为了收复中原，拯救沦陷区苦难同胞，振兴神州而奋斗终生。稼轩此词，与初唐陈子昂的名篇《登幽州台歌》皆具大气魄与大抱负，有天地悠悠，上下千古之慨。但陈子昂诗通篇抒情，景寓其中，而稼轩此词却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子昂诗情调孤独寂寞，慷慨悲凉；稼轩词却豪迈自信，气象沉雄。吴则夷评赞此词：“在稼轩词中为压卷之作。”^①可谓眼光独到。

从上文对辛弃疾几首比兴象征词的分析可见，稼轩纯熟自如地运用“想象出象”“借典造象”“即景取象”这三种方法创造象征意象。《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写他在中秋节“把酒问姮娥”，又飞上月宫，“斫去桂婆娑”，使人间清光更多。这是大胆豪放的“想象出象”。“笑拍洪崖，问千丈、翠岩谁削。”(《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廓之韵》)他手拍仙人洪崖的肩膀，问这千丈翠岩是谁削成。这是兼用“想象出象”和“借典造象”。稼轩在这里化用了郭璞《游仙诗》“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之

句。“青山幸自重重秀。问新来、萧萧木落，颇堪秋否。总被西风都瘦损，依旧千岩万岫。”(《贺新郎·用前韵再赋》)这几句写青山，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萧萧”是出自杜甫《登高》的语典，但主要是“即景取象”，并赋予青山瘦削而有神的独特气韵，借以象征他在世事无常政治失意中仍保持着倔强刚毅的个性品格。青山这个象征意象看似平常，其实颇为新奇鲜活。

在辛稼轩的一些比兴象征词中，交织运用了上述“想象出象”“借典造象”“即景取象”三种方法，三者结合得巧妙自然，犹如天孙织锦，色彩斑斓夺目。请读《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
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
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峡
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
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
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
岸，系斜阳缆。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秋，55岁的辛弃疾被诬告，罢免了福建安抚使。他回江西上饶，途经南剑州，登上双溪楼，遥望西北乌云蔽天，心潮汹涌，写下这首悲愤苍凉、怀古伤今之词。全篇除“千古兴亡”以下三句直抒胸臆外，几乎都是交错运用“想象出象”“借典造象”“即景取象”三种方法营构象征意象与象征灵境的。开篇即写他要用倚天万里的长剑扫荡西北妖氛，用了宋玉《大言赋》和《庄

^①辛弃疾著，吴则虞选注：《辛弃疾词选集》，第277页。

子·说剑》关于长剑倚天的典故,又发挥了非凡的想象与幻想,创造出雄奇壮丽、大气磅礴的象征意象。其下的“斗牛光焰”是借典造象,“潭空水冷,月明星淡”是即景取象,而“风雷怒,鱼龙惨”又是借典造象与想象出象结合。“峡束苍江”三句是即景取象结合想象出象,“元龙老矣”三句是借典造象结合想象出象。结韵三句皆是即景取象,词人以眼前所见白描写实之景物结情,兼用象征寄托,可谓信手拈来,天然入妙。英年早逝的邓红梅女史评曰:“斜阳既是国运难振的象征,也是自己年华不再的隐喻,系缆止步的行人,是他遭逢这一风雷鱼龙把持着政局的时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的隐喻。”^①真是灵心慧眼,评析精彩!

二、象征灵境的雄奇性、戏剧性、层深性

作为一位跃马沙场建立奇功的虎胆英雄,辛弃疾的主要性格特征是雄豪刚毅,智勇超群,善于出奇制胜。体现在审美趣味上,就是格外爱好雄奇、壮丽、神秘的事物。他晚年闲居瓢泉开山径,偶得一石壁,喜其嶙峋突兀,因以“苍壁”命名,并作词二首,其中《临江仙》一首有句云:“莫笑吾家苍壁小,峻层势欲摩空。相知惟有主人翁。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明白地表达他对泰山华岳这类雄奇、巍峨、险峻景物的钟爱。他在瓢泉山庄建有鹤鸣亭,赋诗云:“翠竹栽成占一丘,清溪映带极风流。山翁一向贪奇趣,更引飞泉在上头。”^②也坦率地宣称他“一向贪奇趣”。苏轼曾说:“诗以奇趣为

宗,反常合道为趣。”^③可见,稼轩同他所钦佩的前辈文学大师苏轼都是酷爱奇趣者。在稼轩的比兴象征词中,我们就读到了一首首富于雄奇、怪诞、壮伟之趣的佳篇,如《兰陵王》: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苕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君看启母愤所激,又俄倾为石。难敌。最多力。甚一念沉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

此词有一个很长的题目,可以说是一篇志怪笔记小说。为省篇幅,不录。邓广铭评析说:“此词上中片用苕弘、郑人缓、望夫妇、启母四人变化之事。苕弘化碧玉,玉自石出;缓化秋柏之实,实石音同;望夫妇、启母皆化为石。四例取证古来怨愤变化为石之事。下片以张难敌虽斗败,化为石而仍作困斗之状,赞扬张难敌抵死不屈之精神。则此记梦词亦托意甚微,藉以抒胸中激愤之气耳。”^④邓先生指出此词运用象征寄托手法,而且“托意甚微”,乃中肯之论。稼轩运用以文为词与比兴寄托手法,满怀激情塑造斗败化石仍困斗不已的张

①邓红梅:《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②辛弃疾著,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56页。

③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47页。

④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23页。

难敌形象，乃是为了激励南宋爱国志士发扬其“抵死不屈之精神”，坚持奋斗，直到成就统一山河的大业。稼轩把五个死后化石的奇人奇事投入其如烈火燃烧的感情洪炉，精心炼出了这首雄奇恢诡、悲壮沉郁、动人心魄的象征词篇。

笔者曾发表《论稼轩词浪漫神奇的“造境”》^①一文，文中有“梦天游仙的奇幻境界”与“模仿屈原的浪漫传统”两节，评析了《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山鬼谣》（问何年）、《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等词篇。稼轩在这些作品中都营造出雄奇瑰丽、缥缈迷离的象征灵境。为避重复，本文不再细论。但为了使本文的读者对稼轩词象征灵境的雄奇瑰丽、缥缈迷离有具体真切的了解，这里再举一例：《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上片云：

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

乾道五年（1169）辛弃疾 30 岁，任建康通判。史致道，名正志，时为建康知府，兼行宫留守、沿江水军制置使，当时他主张抗金，与稼轩相知相识。在史致道举办的宴会上，稼轩即席创作了这首词。词人一落笔就生动描绘庄子《逍遥游》中那只“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鸟，它正展翅凌空翱翔，汕笑人世苍茫混沌，只有碌碌无为之辈，罕见气势恢宏的人物。于是，它就毅然飞回天宫深处，收敛双翼，宛若一座巍巍大山，伫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词人以大鹏象征史帅，赞扬他志向高远，气概豪

迈，颇受天子器重。词人展开想象和幻想的灵翼，对神话传说与庄子笔下的大鹏形象作了新的发挥与创造，使此词开篇即弥漫着雄奇浪漫的抒情氛围。唐代大诗人李白《上李邕》起笔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之句。显然，稼轩是有意仿效李白，但他仍感意犹未尽，又妙用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讴歌史帅恰似一尊补天之神将，衣袖里装着五色璀璨的珍奇之石，立志要修补好被象征金寇的妖魔砸破的西北半边天。可见，雄奇性乃是稼轩词象征灵境的第一特色。

辛弃疾的象征灵境，又具有鲜明突出的戏剧性。他模仿、借鉴汉代东方朔《答客难》、班固《宾戏》、扬雄《解嘲》等文，用主客对话体结构，又发挥他诙谐幽默的艺术个性，创作了《沁园春》（杯汝来前）与《沁园春》（杯汝知乎）姊妹篇，前者写戒酒，后者写开戒。他在词中是主人，酒杯是仆人，主仆两个角色搬演了两出风趣诙谐的小喜剧，就像唐代流行的“参军戏”。但这是两出含泪的喜剧。词人运用比兴手法，曲折含蓄地抒发出他政治失意、借酒浇愁的深沉痛苦。这二首兼具戏剧性与象征性的佳作，是稼轩词的艺术创新。稼轩还有几首有戏剧性的象征词，请读《玉楼春·戏赋云山》：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瞥起云横度，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

开篇就是词人惊问：“是谁半夜推走了这座高山？”

^①陶文鹏：《论稼轩词浪漫神奇的“造境”》，《汉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其后他看见四面浮云弥漫，便道：“我猜是你们干的。我时常面对着两三座山峰，今日我走遍了溪头，都找不着了。”下片描写西风骤起，浮云飞散，忽见东南边一座山峰宛如顶天巨柱拔地升起。老僧拍手大笑相夸道：“好教人欢喜呵，青山你依旧住在这里！”这首词仅五十六字，却写了词人自我、老僧、浮云、青峰、山溪，写了词人与浮云的对话，写了老僧拍手笑夸青峰的言语动作及其心态变化，情节生动曲折，戏剧性更强。与《沁园春》（杯汝来前）相比较，它是喜气盈盈之剧，语言诙谐风趣，并非喜中含悲，却也有深邃的比兴象征。老僧赞扬云雾终究掩埋不住青山，在写景中蕴含哲理。如果联系稼轩其他词所写的“浮云”，如“举头西北浮云”（《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满江红·中秋寄远》）；还有“东南”，如“凭栏望，有东南佳气”（《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此词的“浮云”，可以看作是暗喻侵占神州西北中原的金兵，而冲破浮云跃出的“东南天一柱”，不就是南宋军民抗金救国坚强意志的象征吗？稼轩的友人刘过模仿稼轩，也创作了一首对话体的《沁园春·寄稼轩承旨》^①，写他与白居易、林逋、苏轼一道看西湖、游天竺、访孤山梅花，其构思与情节更大胆、离奇、荒诞，富有艺术创新，但遗憾的是，刘过此词却没有稼轩词以比兴象征寄寓家国情怀，缺乏丰富深厚的思想内涵。

辛弃疾词的象征灵境更具层深性。不论中长调还是小令，多是转折顿挫，层层深入，毫不板滞，

绝不单薄。恰似大江潮涌，波澜起伏；又如层峦叠嶂，路转峰回。上文所举《摸鱼儿》（更能消）词，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1就赞叹：“起句‘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②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亦云：“上片以春去作为比喻，却分作多少层次。先说再经不得几回风雨了，这是一层。因怕花落，便常常担心花开太早了，何况今已落红无数，这又是一层。但春虽归去，春又何归？故反振一笔‘春且住’。为什么要住？听说天涯芳草无归路，这又是一层。明明无处可去，它却偏偏去了，那更无话可说，算起来只有檐前蜘蛛网挂着的飞絮，是春光仅有的残痕。”^③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评析下片：“‘长门’两句，言再幸无望，而所以无望者，则因有人妒也。‘千金’两句，更深一层，言纵有相如之赋，仍属无望。脉脉谁诉，与‘怨春不语’相应。‘君莫舞’两句顿挫，言得宠之人化为尘土，不必伤感。‘闲愁’三句，纵笔言今情，但于景中寓情，含思极凄婉。”^④前文所举《玉楼春·戏赋云山》也被明代卓人月评赞为：“一气呵成，无穷转折。”^⑤我们再尝鼎一脔：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

①唐圭璋编纂：《全宋词》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761页。

②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531页。

③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537页。

④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538页。

⑤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1106页。

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
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
醉明月。（《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此词是稼轩闲居瓢泉之作。茂嘉是其族弟，排行十二，故称。其人才气纵横，有抗金救国壮志，因事被远贬桂林。词的起笔别具匠心地用三种鸟儿伤春的悲鸣声，烘染出兄弟离别的浓重伤感氛围。其后即打破词分上下片的章法结构，连用五个典故，寄寓作者忧国愤世情怀。前三个古代薄命女子离别的典象，衬托他送别族弟的哀伤，也象征寄托他志大才高却被投闲置散的悲愤。后两个失败英雄辞家去国的典象，抒发古代英雄壮志未酬的悲慨，也寄寓着作者对抗金事业受挫的痛心。“啼鸟”二句回应开篇，又翻进一层，极言人间“长啼血”的别恨比春归之恨深重百倍。歇拍二句回归送弟，抒写茂嘉去世后他的孤独寂寞。俞平伯《唐宋词选释》指出此词是“借题发挥”，“将个人身世和家国兴亡打并成一片”^①。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赞赏此词：“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②梁启勋《词学》下编说：“伯兄（指梁启超）谓此词用语无伦次之堆叠法。于极倔强中显出极妩媚。”^③笔者深感此词大气包举，沉郁悲凉，转折层深，针线细密，章法确实严谨绝妙，是词人呕心沥血、戛戛独造之作。笔者诵读稼轩比兴象征词，无论是长调还是小令，都感觉如同乘竹筏畅游武夷九曲，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雄秀幽深风景，真使我身心俱醉！

三、象征词篇的多义性、歧义性、开放性

辛弃疾努力创造象征意象营构象征灵境，是为了使其词作的情思内涵丰富深厚，含蓄蕴藉，发人深思，耐人品味。闻一多论述比喻与象征的区别说：“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闻先生说的‘隐语’即象征）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④闻先生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象征与比喻的明显区别，象征拥有比喻罕见的隐蔽性、暗示性、模糊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看一首辛词《行香子·三山作》：

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花絮飘零。莺燕丁宁。怕妨侬、湖上闲行。天心背后，费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

笔者初读此词，只感到稼轩模仿同乡前辈李清照，用口语白描福州地区清明时节春雨未晴、风云不定的气候和景色，抒发他意欲归耕不得，要游西湖因道路泥泞又不能的烦闷忧虑，写得情景交融，清婉灵秀，令人喜爱。而梁启超在《辛稼轩先生年谱》中考证此词是绍熙五年（1194）春，55岁的辛弃疾于福建安抚使任上作。他因为不堪忍受朝中及地方官场小人的谗谤迫扰，从上一年冬天到此时，已屡次上表请求退休，但朝廷一直不

①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86页。

②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84页。

③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84页。

④闻一多：《神话与诗·说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17页。

予答复。梁氏说,此词发端“要趁归耕”就“直出本意,文意甚明”。“小窗坐地”五句,“谓受谗谤迫扰,不能堪忍也”。“花絮飘零”三句,“尚虑有种种牵制,不得自由归去也”。“天心肯后”到结尾,“是君意难测,然疑间作,令人闷杀也”。梁氏最后总结云:“此诗人比兴之旨,意内言外,细绎自见。”^①可见辛弃疾词的象征灵境多具惆怅迷离、幽玄缥缈的艺术特色。其象征意蕴若隐若现,似无实有,空灵蕴藉,足以吸引众多的词评家和读者阅读的兴趣。而人们的文学欣赏水平不一,思维能力也不同,从而在解读中显现出辛弃疾比兴象征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开放性。我们看近代以来人们对宋词《青玉案·元夕》的解读情况,词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
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词题为“元夕”,全篇描写南宋都城临安元宵夜的繁华热闹景象。词人绘声绘色,写光写香。粗心的读者可能只看到一幅满城狂欢的图画。词评家陈廷焯、俞陛云等人更注意词的结尾,把这首词看作是爱情词、艳体词^②。梁启超评析此词是“自怜幽

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见梁令娴《艺蘅馆词选》)^③。俞平伯说:“结尾只用‘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语,即把多少不易说出的悲感和盘托出了。”^④刘扬忠认为:“这个孤独美人的形象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作者自己在政治失意之后,宁愿幽居,甘受冷落,也不随大流的品质。”^⑤王兆鹏指出:“这位美人,与其说是词人追寻的对象,毋宁说是词人自己的写照。临安人彻夜狂欢,直把杭州作汴州。而英雄辛弃疾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孤独而无奈地审视着这表面繁华却暗藏危机的社会现实。”^⑥可见,从古到今,越来越多的读者看到了这首词表面上是写寻觅美人,其实是用比兴象征手法寄托政治怀抱。但对词人所寄托的情意,却有失落感、孤独感、清醒感、忧患感等不同理解。身兼诗人、哲人、学者的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论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之三种境界”时,别出心裁、独具只眼地把晏殊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视为第一境界;把柳永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视为第二境界;而把辛弃疾此词的“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看作是第三境界,即千百回求之不得却偶然得之的境界,为最高之境界^⑦。正是辛弃疾高妙的艺术构思,运用对比强烈的美的意象,营构出一个复杂深邃、幽玄缥缈的象征灵境,向古今众多读者显示出其多义性、歧义性、开

①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827页。

②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813页。

③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813页。

④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814页。

⑤刘扬忠评注:《辛弃疾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⑥王兆鹏:《辛弃疾词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6页。

⑦施议对译注:《人间词话译注》,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放性。此词恰似一朵盛开千载的宝石花,闪烁着缤纷多彩、永不熄灭的光芒。

更令人赞叹的是,辛弃疾在篇幅短小的令词中,也能营造出生动、丰富、复杂、深邃的象征灵境,同样使读者见识到其多义性、歧义性、开放性。例如,被明人李濂《批点稼轩长短句》誉为“脍炙今古”^①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此词八句,前二句七言,后六句五言,两句一韵,平仄韵交替。通篇运用比兴象征手法,每一联都引发古今词评家截然不同乃至针锋相对的见解。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一“辛幼安”条云:“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因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②近人陈匪石《宋词举》曰:“‘多少行人泪’,包括不少伤心事,不专指隆祐而言。‘长安’指汴,遥望西北,‘无数’之‘山’隔之,喻恢复之事难也。”^③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笔注》卷1评:“罗大经谓‘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殊为差谬。稼轩一生奋发有为,其恢复素志、胜利信心,由壮及老,不曾稍改,何得在南归不久即生

‘恢复之事行不得’之念哉!”^④郑騫《稼轩词校注》卷1说:“望长安而青山无数,伤朝士之蔽贤也。”“闻鹧鸪之句谓还朝行不得也。赣江不受青山之遮,毕竟东流,已则终难东归京师。”^⑤邓红梅认为,“可怜无数山”句的“山”,“就具有了象征阻挠他恢复故土之志的主和派力量的象征意义。而这两句合起来,又含蓄地表明了作者对中原未复、祖国南北分裂局面的忧心如焚”。“不畏青山遮挡而奔涌东去的流水,也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它可以象征坚持抗金复土者不屈的斗志和胜利的愿望。”^⑥

先师吴小如和学友王兆鹏也各有独到见解。吴先生解释“西北望长安”二句说:“北宋刘攽《九日》诗:‘可怜西北望,白日远长安’才是辛此词真正的出处。”“刘攽的‘可怜’是感伤情调,辛则为遗憾之词。盖青山无数,尽在北方。凭吊山河,当然大可可怜惜了。”对于“青山遮不住”二句,吴先生说:“山在江畔,再高大也拦不住江水奔腾……鄙意这两句真正含义,似应解为青山虽无数,却遮不住敌人兵马;而宋室半壁山河,最终恐仍不免付诸东流水。”“白居易《山鹧鸪》诗云:‘山鹧鸪,尔本此乡鸟,生不辞巢不别群,何苦声声啼到晓!啼到晓,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辛本北人,南来后偏偏遇上不争气的南宋小朝廷……这正是使得作为北人的辛幼安忧愁不已的主因。”“罗大经揪住‘行不得也’一句不放,真是

①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1211页。

②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1213页。

③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1214页。

④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1215页。

⑤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1215—1216页。

⑥邓红梅编著:《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集》,第12—13页。

近乎痴人说梦也。”^①王兆鹏考证此词作于淳熙三年(1176)。由于前一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时平定了茶商的武装叛乱,宋孝宗下诏推赏,先授秘阁修撰,次年又调任京西转运判官,于赴任途中路过造口,作此词。此时,词人内心欣喜、骄傲,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又交织着失落、不满、怅惘、忧虑。因此,“‘西北望长安’,当然是思念中原沦陷的故都汴京”。“赣江滔滔而去的江水,让词人联想到了光阴易逝”,“不知道何时才能受到朝廷重用,让他统帅千军万马,杀向北方,收复中原失地”。而结尾二句,“词人恍然觉得那是江西的父老在声声挽留他”。“愁余,就是愁予,让我生愁的意思。语出屈原《九歌·湘夫人》”,“辛弃疾内心是把自己看作是屈原的化身”,“他就像屈原一样,徘徊在水边,充满了忧伤”^②。

从上面的摘引可见,古今众多词评家对辛弃疾这首《菩萨蛮》小令词的解读与评析,观点相同的少,相异的多,相异的观点有的大相径庭,有的更是针锋相对,但大多持论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孰是孰非,难以判定。词评家们都有一个共识:这是一首成功地运用了比兴象征的杰作,它小中见大,浅中寓深,“不仅抒个人身世之感,兼有家国兴亡之戚”;“惜水怨山”“慷慨生哀”“血泪淋漓”“宕逸中亦深炼”,堪称“大声鞞鞞”的《菩萨蛮》经典之篇^③,其所具有的多义性、歧义性、开放性,给现今与未来的读者提供了继续进行创造性解读与评析的广阔空间。又如上文所举《玉楼春·戏赋

云山》,笔者认为:词中所写冲破浮云跃出的“东南天一柱”,是南宋军民抗金救国意志的象征。吴则夷却说:“此用禅理作词也。慧忠曰:‘念想由来幻,性自无终始。若得此中意,长波自当止。’浮云翳山山不见,念想幻也。云去山住,性自在也。此类词似写景,实似偈语。在《稼轩词》又是一格。”^④我的观点和吴先生的解释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但各有理据,可谓见仁见智,共同见证与彰显稼轩比兴象征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开放性。

在辛弃疾词集中,也有一些几乎全篇或白描或彩绘景物,只在结尾一两句于写景中暗含比兴象征,使词篇陡然提升到象征灵境,并且产生了令人品味不厌、诠释不尽的多义性、歧义性、开放性。《鹧鸪天·代人赋》是精彩的一例: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此词写江西上饶乡村的春景农事。作者像一位丹青妙手,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动静结合、远近有致的风景画兼风俗画。画中景物都那么饶有生趣,散发出乡土的生活气息和早春的蓬勃朝气。词的结尾,作者推出了在溪头早春绽放的荠菜花的特写镜头,并将它同城市中愁风苦雨的桃李花作强烈对比,顿时使此词上升到一个

①吴小如:《古典诗词札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0—402页。

②王兆鹏:《辛弃疾词选》,第23—26页。

③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1212—1213页。

④辛弃疾著,吴则虞选注:《辛弃疾词选集》,第246页。

隐含丰富深邃情意的象征灵境,引发人们对其美妙的象征意蕴的热烈探寻和讨论。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说:“末尾二句,可见作者之人生观。盖以‘城中桃李’与‘溪头荠菜’对比,觉‘桃李’方‘愁风雨’摧残之时,而‘荠菜’则得春而荣茂,是桃李不如荠菜,亦即城市生活不如田野生活也……城市繁华难久,不如田野之常得安适。再推言之,则热心功利之辈,常因失意而愁苦,不如无营、无欲者之常乐。此种思想与道家乐恬退、安淡泊之理相合。”^①吴则夷说:“春在野而不在城,此显然深有寄慨。”^②邱俊鹏说:词人“由衷地体验和感受到真正的春光是在这广阔的农村。这固然反映了诗人爱好清新、朴素、健壮的美学观点,但更表现了对城市(特别是官场)熙熙攘攘生活的厌弃。”^③余恕诚说:“荠菜花不怕风雨,占有春光,在它身上仿佛体现了一种人格精神。”“一方面借荠菜花的形象自我写照,一方面又隐隐流露这样的意思——不要做愁风雨的城中桃李,要做坚强的荠菜花,以此与友人共勉。”^④郁贤皓说,这两句词“不但赞美农村比城市有生气,而且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朝廷上做官,享受荣华富贵,就像桃花、李花那样娇弱,经不起风雨打击,经常担惊受怕;倒不如在农村里闲居,就像野荠菜那样不怕风吹雨打,自由自在,才是有生命力的”^⑤。钟陵说:“曲折地表达作者对官场风雨的厌恶,又

悟出了美在自由朴素之中的真谛。”^⑥如果笔者继续搜集对稼轩这一联词的评析言论,可能还要占几页稿纸。笔者认为,辛弃疾用朴素自然又精炼警策的语言,把写景、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在这两句词中创造了生动鲜活、写实兼象征的意象,使全篇展现出一个清新美妙的象征灵境。而这两句词蕴含着极其丰富深邃的哲理,激发那么多学者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诗学,从人的生活、人格、个性、生命等视角探讨其奇趣妙谛,愈品愈觉其意味无穷。辛弃疾一生无限热爱伟大的东晋诗人陶渊明,作词也努力学习陶诗。笔者认为,辛词的“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可与陶诗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媲美,二者堪称中国古代田园归隐诗词的“点睛之笔”。

结语

中国现代杰出诗人艾青说:“象征是事物的影射;是事物互相间的借喻,是真理的暗示和譬比。”^⑦但如此高妙的象征手法,在辛弃疾之前的唐宋词坛上却极少有人运用。只有苏轼和周邦彦各有几首运用比兴象征的词,颇为人赞赏。苏轼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念奴娇》(凭高眺远)、《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等,在写景咏物中寄托了作者孤高失时、怀才不遇之慨;周邦彦的咏物词《花犯》(粉墙低)、

①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981页。

②辛弃疾著,吴则虞选注:《辛弃疾词选集》,第225页。

③邱俊鹏:《生意盎然的农村画卷》,齐鲁书社编辑:《辛弃疾词鉴赏》,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361页。

④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546页。

⑤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03页。

⑥钟陵:《辛弃疾》,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⑦艾青:《诗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01页。

《六丑》(正单衣试酒)、《大酺》(对宿烟收)等,借咏花和春雨含蓄深婉地抒发身世之感。詹安泰精辟地指出:“(南宋)国势陵夷,金元继迫,忧时之士,悲愤交集,随时随地,不遑宁处;而时主昏庸,权奸当道,每一命笔,动遭大缪,逐客放臣,项背相望;虽欲不掩抑其辞,不可得矣。故词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亦最深婉。”^①辛弃疾即是南宋较早写比兴寄托词,并且是写得最多最出色的词坛大家。辛词的象征意蕴,由北宋的抒写个人身世之感拓展到表达抗金救国壮志以及壮志难酬的悲愤,也表达出他对于自然、社会、宇宙、人生的

哲理感悟,使其忧国忧民、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美的诗魂长出了翅膀,翱翔在浩瀚的历史时空。其比兴象征词高超深邃的思想内容与“不伤崭露,不易指陈”^②的表现艺术,对元明清比兴象征词创作的发展和周济等人“寄托说”“词史说”理论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1赞曰:“辛稼轩,词中之龙也。”^③信然,善哉!

(本文原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陶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吴承学、彭玉平编:《詹安泰文集·论寄托》,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②吴承学、彭玉平编:《詹安泰文集·论寄托》,第199页。

③辛弃疾著,吴企明校笺:《辛弃疾词校笺》,第1688页。

运河、漕运与古代中国

——读《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

方 铭

早在五帝时期,中国就开始了河道的治理与疏通工程,唐尧虞舜及夏禹都曾在此项工程上倾注了大量心血。而河道的治理与疏通,不仅仅可以预防洪水的泛滥,同时也为水陆交通和灌溉提供了便利。春秋开始,漕运的功用逐渐显现,对古代政权的巩固、军事的胜利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隋唐以降,漕运作用更加重要,甚至成为维系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命脉。这正如宋人张方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但是直至民国时期,运河与漕运的研究一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运河与漕运的研究逐渐升温,并出现了一批相关著作,其中既有通史性的,又有断代性的,涉及运河开凿、漕运组织、制度管理、军事斗争、农业生产、商业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但是依旧没有一部系统地叙述中国运河与漕运的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出版的淮阴师范学院张强教授所著五卷本300余万字的《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中国的造船史和航运历史都非常悠久,不但利用自然河道行舟,同时还建设运河,以疏通河道的运输障碍。唐尧时期开始的鲧、禹父子治水的历史,是河渠建设可靠的传世文献记载。作者从夏禹治水开始,并且通过对出土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等的整理,认为“在夏王朝建立的初期即前

两千年前”,已有开渠、疏导河流等行为及意识应该没有任何疑义,而西周中期则是古代中国开挖河渠的重要阶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楚、齐、秦等国都积极致力于开凿与建设运河。

在运河与漕运的研究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处于薄弱环节,张强教授广泛搜集资料,对这一时期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该书对从建安时期曹魏为转运粮草等修建的睢阳渠、白沟、五龙渠、贾侯渠、讨虏渠、成国渠、白马沟、广漕渠到两晋时期的九龙渠、杨口水道,再到南北朝时期疏浚秦淮河、重修方山埭、赤山塘等,都有专章专节的论述。其中在对宋齐梁陈阶段的专章论述中作者指出“刘宋一朝,疏浚了建康以东的秦淮河”,“齐明帝一朝,沈瑀重修了湖熟境内的方山埭和赤山塘”,陈代则重点兴修和改造了破冈渎等,这对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运河与漕运是与古代社会各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古代的都城选址、城市布局和商业发展等都有重要影响,而新的政治中心的建立反过来也会影响运河和漕运的发展。作者充分关注到了这些问题,在书中都有较为客观而又全面的论述。如东汉刘秀建都洛阳,与消除漕运障碍、节省漕运费用有关。同时以洛阳为中心,围绕新的漕运需要,开挖了新的运河,形成了新的漕运格局和形式。特别是元代以后,为了保障大都的物

质供应,改变了隋唐以来南北大运河的具体线路,变曲为直,修建了京杭大运河,促进了元大都的繁荣。并且随着大运河线路的开通,又有一批新的运河城市兴起与繁盛。而运河的开通与漕运的发展又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运盐河是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它一头通往盐场,一头与运河相连,为榷盐提供了便利的水道”,是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稳定社会生活的重要保证。作者在书中运用大量篇幅对运盐河及其相关内容做了考述,并指出了其功用和重要影响。如“运河与运盐河串联在一起,扩大了商贸往来及榷盐即征收盐税的范围”,起到了又一商贸大通道的作用,并且扩大了税收来源。同时作者指出,“宋代江淮之间的运盐河建设是与海塘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海塘除了可以遏制潮水,保护当地的民田及盐灶外,还有保护运盐河的作用”。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运河与漕运的全貌显然具有启发性。

该书的一大贡献,是对运河和漕运研究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仔细梳理,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提出了可靠的意见。

鸿沟是一条兴修较早、横亘中原、沟通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运河,但由于相关历史典籍及文献档案的散佚,今人基本认为鸿沟是一条完全由人工开挖的河渠。对此问题,作者有仔细的辨析,认为在“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的过程中,“鸿沟或利用了相关区域的河流及水资源,或利用了河流行经这些区域的河道”。作者还对鸿沟为什么利用茱泽,为什么要“移泽之名于

河北”的问题做了详细考证,解决这一运河史上的难题。

隋代运河建设始于隋文帝。隋文帝兴修了广通渠,重修了邗沟,建设了十三州水次仓等,后世多将广通渠与富民渠视为同一条河渠。作者认为,广通渠与富民渠两者多有区别,不能视为同一条河渠,因为二者长度不同,开挖时间、开挖者不同,起点不同。“站在历史的高度,隋文帝兴修河渠及加强漕运揭开了隋炀帝从事河渠建设的序幕”。

过去有“引汶水达舟于御河”和“引汶水以通水道”的记载,似乎说的是会通河的补给水源主要来自汶水,作者认为,会通河是“借用汶水河道”将不同的河流及泉水引入其中,而分水入运河时主要利用的是汶水的支流泲水河道,但前人往往直接以“汶水”代称泲水。作者指出:“在这中间,调节会通河水位的水源包括以济水等为代表的黄河水系和以泗水等为代表的淮河水系,两大水系同时汇入会通河,为其航道提供了基本保障。”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成功解决了运河和漕运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运河、漕运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对于我国的民族融合及形成统一的政治格局与经济格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张强教授以时间为纵线,以运河与漕运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各方面为横线,积二十余年心力,成就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运河和漕运研究著作,令人钦佩。

(本文原刊于《光明日报》2022年12月12日第4版。方铭,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

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成立于 1988 年, 挂靠在历史学院。中心依托陕西地方优势资源, 以周秦汉唐各朝代的历史为研究对象, 是国内最早以“周秦汉唐”专题命名的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现有专职教授 12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4 人, 中心主任由历史学院院长李军教授兼任。

周秦汉唐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强音, 又是中国历史的早期发展阶段, 要建立中国历史学体系就必须加强周秦汉唐研究。周秦汉唐是中国文明开放强盛的高峰期,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对其研究有助于振奋民族自信心。西北大学地处周秦汉唐文明故地, 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周秦汉唐研究是西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陈直、马长寿、陈登原、林剑鸣、黄留珠、周天游、余华清等一批史学家执教于此, 积淀出具有学术特色和优势的丰硕成果。

周秦汉唐研究中心在黄留珠、陈峰等历任主任的推动下, 凝聚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史研究方向的核心力量, 不断提升周秦汉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水平。为了集中展示周秦汉唐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周秦汉唐研究中心与三秦出版社联手推出大型学术年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目前已连续出版了 11 辑。周秦汉唐研究中心还坚持编辑出版了 5 辑《秦文化研究》。研究中心成员以传承、弘扬周秦汉唐文化为己任, 围绕周秦汉唐时期的历史与文化, 出版了系列论著, 其中代表性成果有:《周秦汉唐文明》《陕西通



史·秦汉卷》《古代兵学文化探论》《秦都城研究》《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秦与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集》《秦汉历史文化论稿》《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汉魏名士研究》《隋史十二讲》《唐代军费问题研究》《武则天传》等。为了发挥周秦汉唐研究中心的普及作用, 让民众了解周秦汉唐时期的历史与文化, 研究中心成员还出版有普及性读物, 如《纵横家史话》《大风起兮: 图说秦汉》《开放的大唐·气象万千卷》等。其中, 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项。

近年来, 为了赓续学术传统, 历史学院持续打造周秦汉唐研究团队, 全职引进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前任会长王子今教授、著名民族史学家周伟洲教授, 设置郑炳林教授史学家工作室, 续聘台湾学者雷家骥教授, 形成了以周伟洲、王子今、郑炳林、雷家骥、史党社、李军、刘蓉、彭建英、贾志刚、裴成国、僧海霞等教授领衔的研究力量。研究中心核心成员史党社教授担任秦文化研究

会的会长,历史学院成为秦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单位。为了进一步发挥研究中心研究、宣传、普及的作用,李军教授作为负责人申报的周秦汉唐文化科普基地成功获批省级科研平台——陕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三年来,周秦汉唐研究中心取得了长足发展。王子今教授、史党社教授分别担任《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李军教授担任编委,并分别承担了“秦汉三国卷”“隋唐五代卷”的主编工作。《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程,已纳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此外,周秦汉唐研究中心还始终致力于周秦汉唐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普及。三年间,研究中心成员出版学术专著17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顶级及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8篇。其中,代表性论著有:《中国古代军政研究》《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秦祭祀研究》《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墨子城守诸篇校注》《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增订本)》《秦汉

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增订本)》等。三年间,研究中心先后主办了“第三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秦汉历史与考古的融合发展暨纪念陈直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五届新史学青年论坛”“秦史青年学者论坛”等多场学术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周秦汉唐历史研究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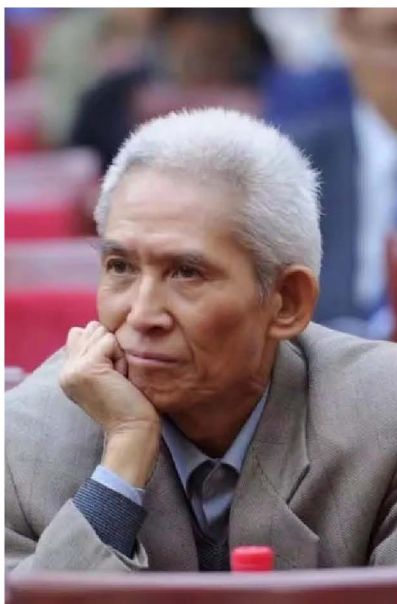
周秦汉唐研究中心将继续团结、引领研究者做好周秦汉唐历史文化的研究、普及工作,服务地方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陕西建设文化强省注入思想活力。



游诗词之碧海,探瑰奇之骊珠

——陶文鹏研究员访谈录

王宏林



陶文鹏近照

陶文鹏,1941年生,广西南宁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1988年调入《文学遗产》编辑部,2004年任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著有《唐诗与绘画》《苏轼诗词艺术论》《宋代诗人论》《唐宋诗词艺术研究》《点睛之笔·陶文鹏说诗/谈词》等,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两宋士大夫文

学研究》《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卷》等。本刊特委托河南大学文学院王宏林教授采访陶文鹏研究员,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黔桂京师育文心

王宏林 陶先生,您好!您是1959年广西唯一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子,大学毕业后被选送到原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文艺组工作,后来又在贵州任记者多年。这种经历在当代学者中是比较独特、少见的。蒋寅先生曾评价您说:“丰富的阅历给他乐天豁达的生活态度,对文学、艺术的热爱让他醉心于对伟大诗人艺术奥秘的探寻,而抑制不住的诗人气质更使他的精神始终充溢着对生活的热情和新鲜感。这乃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常葆学术青春和批评活力的奥秘。”(蒋寅:《序》,陶文鹏:《宋代诗人论》,辽海出版社,2007年,第5页)一般来说,每个人的创作或研究都会打上他生活阅历的印迹,所谓“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您这种治学特色的形成与早年经历有关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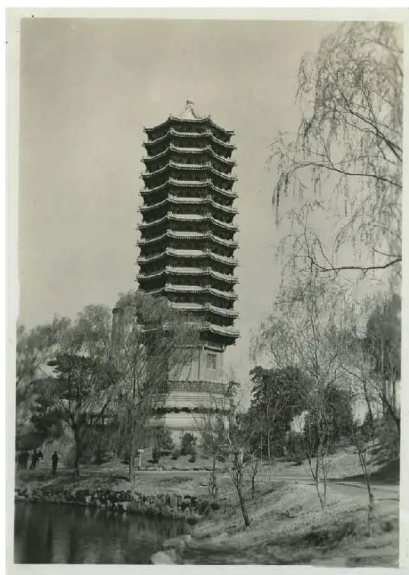
陶文鹏 我的出生地是广西桂林。父亲是水利工程师,但毕生热爱文学,便把未能实现的“作家梦”让我继续去做,极力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从我读高小、初中起,他就要我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读初中期间,在广西的报刊上发表了诗歌、散文,在《广西文学》上发过一篇小说,还在北京的《文艺学习》上发过一首诗。“桂林

山水甲天下”，韩愈写过“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送桂州严大夫》）的赞美诗句。我后来生活和工作的贵州，也是自然风光秀丽幽奇的地方。在遵义地区，更有遵义会议会址红楼、红军山、娄山关、乌江、赤水河等革命名胜，时常激发我的创作灵感，写了一首首诗。例如，我写遵义的《每回，上红军山》说：“每回，上红军山 / 捡拾金黄的松果 / 都会捧起 / 一把迸溅如雨的鸟声 // 每回，上红军山 / 采摘火红的杜鹃 / 都能采到 / 一个可歌可泣的传说 // 每回，上红军山 / 吸一口带薄荷香的清风 / 胸中顿时 / 流过一条红星闪闪的赤水河 // 每回，上红军山呵 / 我都会变成一只白鸽 / 从绿茫茫的林海中 / 衔出一首美丽的诗歌。”所以 1959 年高中毕业，我就毅然报考北大中文系，后来如愿考取，到了我心仪多年的燕园未名湖畔读书。

王宏林 您于 1959 年至 1964 年在北大中文系学习。这个时期，经过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您上过哪些先生的课？与哪些先生交往比较密切呢？

陶文鹏 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的五年非常幸运。我上过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朱德熙和林焘先生的“现代汉语”课；上过文学史家游国恩先生的“先秦文学史”，诗人兼学者林庚先生的“屈原与《楚辞》研究”，小说家兼小说史家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听过文学史家陈贻焮、吴小如、袁行霈先生讲唐诗、唐宋词与明清小说戏曲的课；听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当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的课。此外，还有幸听过从哲学系到中文系开课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中国古代美学经典选读”，朱光潜先生的“西方文学史”。这些先生对学生很亲切，循循善诱，学识渊

博，富有创新精神，每人讲课风格各异，但无不引人入胜，听他们讲课，真是一种文学与语言美的享受。在我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以后，交往比较多的是林庚、陈贻焮、吴小如、裴斐、袁行霈等几位先生，因为他们是《文学遗产》的顾问、编委或撰稿人。他们的论著给予我很多教益。比如，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和《唐诗综论》，有很多新的发现和独到之见，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朱自清：《朱佩弦先生序》，林庚：《中国文学简史》“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725 页）。林庚先生的著作，是我常读常新、获益良多的案头书。



20 世纪 60 年代的北京大学博雅塔

王宏林 这个时期，杨晦先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杨先生有个著名的主张：中文系是培养学者的，不是培养作家的。这对您有没有影响？

陶文鹏 我刚听到杨晦先生这番话的时候，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把“诗人梦”“作家梦”

全浇灭了。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我才对这个主张有了正确认识,明白了培养更多的学者和教师是祖国和人民的急迫需要,也明白了作家不是在学院里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应当服从祖国的需要。我到图书馆借了杨晦先生青年时的成名之作《曹禺论》来阅读,书中既充分肯定曹禺《雷雨》等剧本的卓越艺术成就,又毫不客气地分析其缺点,见解犀利、精辟,体现了著者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杰出才能。这使我对他格外敬仰,并深深感受到,做一个文学研究学者,必须有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情。文学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和兴味的工作,值得为此献出毕生精力。当然,如果有生活积累和艺术灵感,适当利用假期写些诗文,也有利于研究水平的提高。



杨晦(1899—1983)

王宏林 您从北大本科毕业后,曾在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文艺组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后来这个机构解散,您被分配到遵义地区广播站。是什么机缘使您又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的?

陶文鹏 我在马列研究院工作时间很短,在

遵义广播站工作时间长。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也恢复招收研究生,这使我非常兴奋,本想报考美学、文学理论或现当代文学专业,但这些专业都要考两门外语,我只在读中学时学过一门俄语,考不了。而古代文学专业只需考一门外语,外加一门古代汉语,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吴世昌先生招生的唐宋诗词专业硕士研究生,并且幸运地被录取了。



吴世昌(1908—1986)

王宏林 吴世昌先生是著名红学家,在诗词研究方面也有深厚造诣。他是如何指导您学习的?另外,这个时期,中国社科院还有钱锺书等诸多著名学者,不知您与这些老一辈学者有没有交往?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学习情况吗?

陶文鹏 吴先生治学,“好究根究底,发前人所未见,抉微钩沉,辟新蹊以通幽,不拜倒在权威脚下,不迷惑于人云亦云”(吴令华:《前言》,吴世昌:《词林新话》卷首,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1页)。吴先生要我们这几个弟子以自学为主,刻苦钻研,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他多次对我们说:“对于古代的大家名家名作,不要跟着别人,一味叫

好。”我写了一篇论杜牧七绝的习作,对几首名作我不吝赞美之词。吴先生却打了问号,简明中肯地指出这几首诗的毛病,叮嘱我以后要下工夫细读诗词文本,勇于探新立异,发前人所未见,这使我大受教益,并真切体会到吴先生眼光锐利、文风老辣、功底深厚。因为年事已高,吴先生并未系统为我们开设课程,但给我们每人都开列了必读书单。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去向先生汇报学习心得,先生给以指导,有问必答。吴先生有关诗词的论著,如《诗学杂论》《词学论丛》《罗音室词札》《词林新话》等,我都认真地学习。他独到地发现了唐宋词人在叙事方面的卓越才能,提出了不少新颖见解。例如,吴先生对周邦彦《少年游》等小令词中描叙人物情景故事作了细致的论析,还把柳永、周邦彦词的叙事结构归纳为“人面桃花型”与“西窗剪烛型”,又指出周词的情节结构暗合现代短篇小说的写法,非常精彩。我曾撰写了一篇一万数千字的论文《“写故事”:吴世昌在词学研究上的贡献》(周勋初等主编:《文学评论丛刊》第2卷第1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全面、系统地论述先师研究唐宋词叙事艺术的成就与贡献。我没有机会见到钱锺书先生,但他的《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宋诗选注》等,是我经常阅读和温习的名著。钱、吴两位先生以中西文学参照、古今文学贯通、不同文体比较的广阔学术视野,在深细研读文本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的研究方法,为我研究唐宋诗词艺术作了最好的示范。此外,辅助吴先生指导我们学习的张白山、乔象钟、吴庚舜三位先生,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关怀备至,带领我们参加学术会议,引领我们访问俞平伯、蔡仪、范宁等先生,在北师大听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讲“中国诗学”,去北大听日本汉学家

吉川幸次郎讲“杜甫诗歌”……总之,我的三年硕士读书生涯过得十分充实、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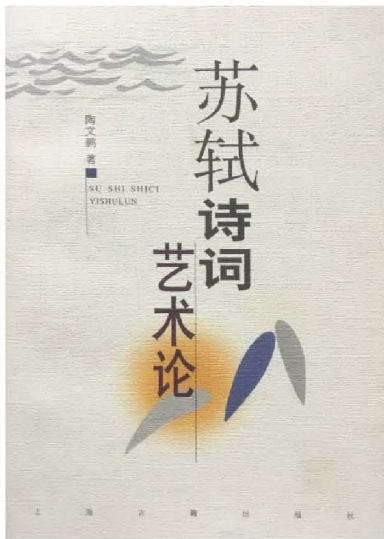
吴世昌:《词林新话》书影
北京出版社 1991年版

二、授情度理发奥旨

王宏林 您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苏轼山水诗研究》,后来您又出版了《苏轼诗词艺术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可以说,您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从苏轼研究起步的。王水照先生在给《苏轼诗词艺术论》所作序文中指出:“全书具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感,有利于推进论证的深入,丰富了学术含量,使之优入著作之林。”当时学界已出版多部苏轼研究专著,您的研究有什么独特的视角或理论、方法吗?请谈谈这部书的写作情况。

陶文鹏 我特别喜爱苏轼,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识、无与伦比的文学艺术才华以及在坎坷经历中磨炼出来的豁达乐观情怀,都使我高山仰止。我自知学问根底不深,故而只能从自己感兴趣的美学与艺术角度切入,专门探讨苏轼的诗词创作艺术。在我看来,文学是一门艺术,艺术以创造美、表现美为首要追求,杰出的作家都善于传自然景物之神、尽自然万物之变、穷自然固有之理、寓主

观之情意。因此,全书主要从“美”“神”“变”“理”“意”五个方面,围绕诗画关系和自然山水两个专题展开研究。与其他苏轼研究专著相比,我这本书的学术水平不够高,也与苏轼伟大的成就不相称,只是传达了我对苏轼诗词之美的真切感受罢了。



陶文鹏:《苏轼诗词艺术论》书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王宏林 您过谦了。所说“美”“神”“变”“理”“意”似乎贯穿了您治学过程的始终。就“美”而言,曹济平先生《试论苏轼的山水诗》(《文艺论丛》第13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指出,苏轼山水诗的创作是他的仕途起伏和生活态度的直接体现。您的《论苏轼诗中的自然山水动态美》却着重强调:苏轼的山水诗与李白、岑参、韩愈一脉相承,更多地表现了大自然蓬勃旺盛的生机和奔腾磅礴的气势,这种对自然山水动态美的显示才是苏轼山水诗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可以看出,探求“美”是您研究的主要追求。您是如何体悟对象之美并加以研究的?

陶文鹏 确实,挖掘诗人运用独特艺术手法表现大自然与社会生活之美,包括诗的情思之美、意

象之美、意境与风格韵味之美,是我研究最着力的地方。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使命,就是要拂去蒙在那些精金美玉上的尘土,让大众感受到经典作品特有的美。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崇高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视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教育、道德建设乃至科学技术发展服务。受这一时代风气的影响,许多古代文学研究者往往用文学作品为材料,来研究上述各方面的问题,让文学为其他学科“打工”。例如,有人探讨杜甫的教育思想、李贺患什么病、由唐诗看唐代妇女的地位和命运、从孙悟空的成长看人才的培养等。然而,我们不要忘了,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艺术的核心追求是“美”。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回归到文学研究的“初心”。比如吴文英这个南宋词人,古人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张炎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词源》卷下),周济称“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当代学者叶嘉莹、钱鸿瑛、陶尔夫、刘敬圻、邓乔彬等,对梦窗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作了全新的阐释。我在阅读梦窗词时,也感到其作品充满奇思壮采,在南宋词坛可谓独树一帜。我发现,梦窗词描写气味千姿百态,有一种灵妙诞幻之美。例如《高阳台·过种山》“最无情,岩上闲花,腥染春愁”,营造出荒凉悲怆的意境;《踏莎行》“绣圈犹带脂香浅”和《风入松·春晚感怀》“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都是运用气味描写,把他对爱妾的感情表现得那么痴迷执着、优美动人,令人拍案叫绝!

王宏林 非常精彩!请接着谈谈您对诗词之“神”的看法。

陶文鹏 在我看来,中国古典诗词抒情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直抒胸臆,一种是借景物或故事咏怀抒情。后一种都要描写客观对象(包括景物和人物)。优秀的作品都是将“以形传神”作为艺术表现的主要追求的。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得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我的《论岑参诗歌创造奇象奇境的艺术》一文,赞赏岑参在其亲身经历与真切体验边塞军旅生活的基础上,既描绘黄沙漫天、雪夜风吼、碎石如斗、风卷石走的自然环境,又表现唐军夜行中干戈相拨、马毛结冰以及军营中砚水凝冻的情景,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更是想象奇丽的神来之笔。在《论苏轼诗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中,我努力总结了苏轼在抒情诗和小叙事诗中所塑造的各种各样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的表现艺术,这个论题在当时很新颖,也有学术价值。

王宏林 您是不是认为“变”也是优秀作家的特质,研究者应当重点关注呢?

陶文鹏 是的,无变不能成其大。梁代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成就,都伴随着革故鼎新的追求。杜甫获称“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之美誉,其实,杜诗每种体裁都有明显的创新。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不都是求变吗?我想,优秀的学者要深入体

会并努力揭示作家身上的新变因素,才能对其文学成就做出中肯的评价。比如辛弃疾被誉为“词中之龙”、宋词第一大家,前人和今人对辛词的研究论著有一千数百篇之多,对辛词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用典等表现方法以及苏辛词的比较多有论述。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论稼轩词章法结构的创新》的新论题,撰文谈了我的一些发现,比如,指出辛词起笔和结尾内容之丰富、句法之多变、风格之多样、韵味之深长,尤其是着重论述辛词打破了双调词上下片分段立意的传统程式,使词意前后紧接,一气贯通。他还妙用多种表现手法,创造出“天问体”“问答体”“对话体”“词眼体”“结尾逆转体”等。此文体现了我对“变”的关注和重视。

王宏林 您的论文,如《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论王维的美学思想》《论苏轼的“诗画同异说”》《论苏轼的自然诗观》等,分别探讨了这些诗人的美学观和诗学观;而《论诗哲杜甫》《论东坡哲理词》,则明确将“哲理”作为研究对象。请问,您对“理”的研讨,主要是基于什么目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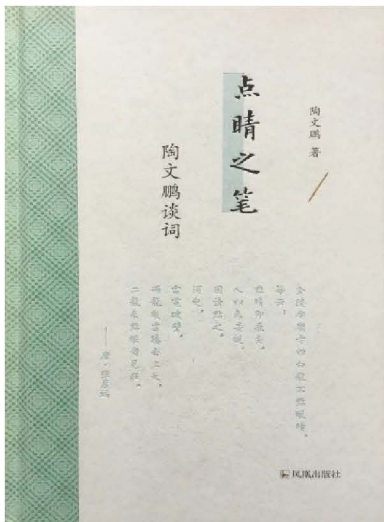
陶文鹏 我很注意联系古代作家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和审美风尚,联系作家本人的文学思想来研究其文学创作。孟浩然是被李白誉为“风流天下闻”(《赠孟浩然》)的优秀诗人,他留下了二百多首诗,却没留下一篇文章,而我在他的诗歌中发现他有一个以“清真”为核心的鲜明、完整的诗歌美学观,从而深化了对孟浩然的研究。王维的美学思想,虽有苏轼等人提出了一些观点,但在我之前,学界从未有人做过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写这样的论文,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所以当时我投给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集刊《美学》,很快就发表了。至于我研究的作家创作中所追求的“理”,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家在作品中对事物

内在之理的阐发。譬如,我认为李商隐同李白、李贺都是擅长创构幻象、营造幻境的诗人,但李商隐的诗幻中有真,还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哲理,如其“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之二),用奇丽的幻象来象征爱情被毁灭的彻骨哀痛,高度概括出世间痴情男女春心萌发的不可抑制以及爱情幻灭后仍然执着追求的精神,这是李商隐诗歌永恒艺术魅力之所在。二是诗人独特的艺术手法,相当于“文理”。比如文学作品中描写梦境十分常见,研究成果不少,但多数研究并未关注作家对梦境的安排。我在《论唐宋梦幻词》中,注意到局部写梦的唐宋词既有真境,又有幻境,由真人入梦,或梦觉返真,真境与幻境的安排并不平直板滞,而是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其中描写梦,基本上被安排在起句、过片或结句,这也是词的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如苏轼的“我梦扁舟浮震泽”(《归朝欢》)、晏几道的“梦入江南烟水路”(《蝶恋花》),以写梦起笔;李煜的“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清平乐》)、张先的“断梦归云经日去。无计使,哀弦寄语”(《惜双双·溪桥寄意》),在过片写梦;而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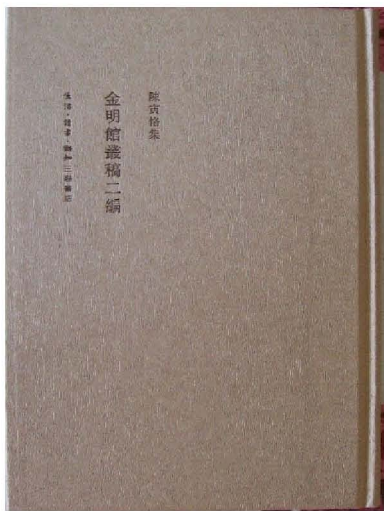
拍,作为神光所聚的通体之眼,或篇末的点睛传神之笔,更有很多写梦境的名句,如李煜“宴罢又成空,梦迷春雨中”(《菩萨蛮》)、晏殊“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踏莎行》)。

王宏林 关于作品之“意”的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刘勰提出“六观”。您是如何把握作品之“意”的?

陶文鹏 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家就文学作品情思意蕴的把握,提出了很多精彩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学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我认为,文学研究者要深刻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运用好恩格斯所谓“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在研究中,还必须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对古代作家怀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从审美的感情体验出发,同古代作家、诗人进行心灵的对话。比如李白《公无渡河》前两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郭沫若认为“黄河西来”是以黄河倒流喻安禄山的叛变,“昆仑”喻唐代的朝廷。其实,黄河决昆仑、触龙门、咆哮万里,只是诗人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反映那场震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歌颂黄河,也是歌颂他本人豪放不羁的气度和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歌颂盛唐士人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更是歌颂中华民族艰苦奋斗战胜灾难的伟大历程。这样的诗句何等壮丽、何等气魄!如果对此诗中历史的、传说的人物和景物意象一一坐实,认为是喻安禄山、唐玄宗、李俶、李璘、朝廷,就显得牵强、狭隘了。先师吴小如先生在《我是怎



陶文鹏:《点晴之笔:陶文鹏谈词》书影
凤凰出版社 2019 年版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书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样讲析古典诗词的》(《文史知识》1986年第9期)一文中讲了一条原则、四点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这是解读诗文之“意”的度人金针、至妙法门。

三、中外古今诗艺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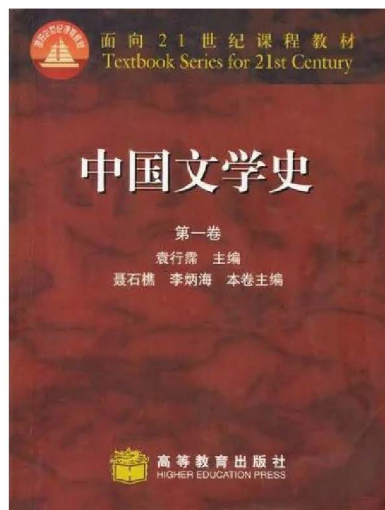
王宏林 陶先生，您多次说不要让文学为别的学科“打工”，强调文学本位以及文学史思维的重要性，请再详细谈一谈。

陶文鹏 “打工”只是一个比方。我所提倡的文学本位，决非闭门造车，而是要坚持开放的格局，具体来说：资料整理、考据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传统方法和现代新方法相结合；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当代意识和历史感相结合；“点”的深掘、“线”的揭示和“面”的拓展相结合；政治的、思想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同文学的、艺术的、美学的乃至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的多种研究相结合；大胆的富于创造性的探索思考与严谨扎实的实证研究相结合。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要运用开放式的观念、方法和手段，拓宽学术视野，采取文

化学视角，对研究对象作多侧面的观照，形成立体的、综合的、多层次的、多样化的研究格局。总之，在开放中求突破，在多元中求创新，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当代性。

王宏林 您所说的“文化学视角”，具体内涵是什么？

陶文鹏 文化学视角是袁行霈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总绪论”中提出的精辟见解。袁先生指出，文学的演进与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兼为史学家、哲学家、书法家、画家，他们的作品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袁先生还指出，有志气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应的资料。我十分认同袁先生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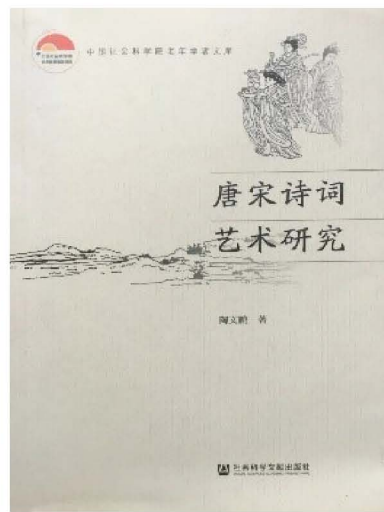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书影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宏林 我注意到您在研究古典诗歌时,常常结合其他艺术来论述,比如《传神肖貌 诗画交融——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结合绘画,《传天籁清音 绘有声图画——论王维诗歌表现自然音响的艺术》结合音乐,《论唐宋词的戏剧性》结合戏剧,《狂草逸诗 舒卷云烟——谈张旭的诗中有书》结合书法,它们是不是基于文化学视角所展开的研究呢?

陶文鹏 结合其他艺术研究诗歌,是由于诗歌与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等艺术有着共同的基本规律,都注重艺术形象的创造,通过艺术形象传情达意。另外,中国古代许多诗人兼有画家、音乐家、戏曲家或书法家等多重身份。我们如果关注诗人在其他艺术领域的造诣或观念,就有可能在不同艺术的对照中更好地鉴赏、评论诗歌,提出新颖的见解。比如,宋诗描写荒寒意象与境界比唐诗大大增多,宋诗追求清奇幽僻、深隽瘦劲的风格、趣味,这些特点与宋代绘画有直接关系。宋诗中的绘画美,酷似画家用枯淡之笔皴擦或用淋漓水墨晕染出的画幅。我们结合宋代的绘画,就更能深切理解宋诗荒寒意境的特点与成因。我的《论唐宋词的戏剧性》是结合戏剧研究唐宋词的。“戏剧性”有利于克服情感的直接宣泄和直线性的表达,使词得以保持和发扬其与生俱来的委婉曲折、含蓄蕴藉之美。而中国古典戏剧的发展又深受唐宋词的影响,很多戏剧的艺术构思、人物形象的设计与塑造,包括唱词与宾白,均直接引用或借鉴唐宋词。音乐与诗歌的关系更为密切,《诗经》中的绝大多数诗是人乐可唱的,许多唐宋词名篇是词人为歌妓创作的。总之,结合其他艺术样式,有利于多角度洞察诗歌艺术之美。

王宏林 学界同仁在评价您的研究时,除了

推重您的“文学本位”论,还赞扬您做到了艺术鉴赏与理论提炼的结合。您的论文在细腻赏析作品文本之后,非常注重总结这些作品所包含的艺术规律和创新价值,有时还引入西方文论、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论的有关论述进行分析,因此既有理论深度,又引人入胜。韩经太教授赞扬您的论文“饶有诗意与文采”(陶文鹏:《唐宋诗词艺术研究》封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刘宁研究员说您“对唐宋诗词艺术的精微体察,时时使人联想起林庚先生对唐诗艺术目击道存般的敏悟”,又“颇有钱锺书先生博观通鉴的神韵”(刘宁:《序》,陶文鹏:《唐宋诗词艺术研究》,第4页)。年轻博士谷中兰写道:“在陶先生诗心、慧眼与灵思的氤氲中,诗词之美宛若珠玑落盘、影流瓣香,随手撷来便有悠悠韵致。”(《培根固元,转益多师——读陶文鹏〈唐宋诗词艺术研究〉》,《励耘学刊》2020年第1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陶文鹏:《唐宋诗词艺术研究》书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

陶文鹏 我衷心感谢学友们的表扬,并把这视为对我这年至八旬老人的关怀与鼓励。我对“理论提炼”的重视,更多是受了程千帆和钱锺书

两位先生的启发。程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出:古代文论的研究,应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也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研究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参见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1—122页)。我在前面提到钱锺书先生和吴世昌先生的几部论著,还有程千帆先生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古典小说技巧漫谈》《〈儒林外史〉试论》等论文,其中都蕴含着他们研究古代文论这两个方面许多洞幽烛微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写《论李商隐诗的幻象和幻境》一文,就吸收九叶派诗人兼诗论家郑敏《诗的内在结构》的有关论述,指出李诗具有与现代派诗相似的多层的内在结构,既有表层意蕴又有深层意蕴。美国意象派创始人之一庞德的名作《在一个地铁车站》写道:“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孙绍先、周宁主编:《外国名诗鉴赏辞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744页)运用了实象与幻象的复叠对比,使这首仅有两行的小诗也具有立体的多层结构。可以看出,李商隐运用幻象与幻境建造诗的多层结构,同西方意象派诗颇为相似,李商隐可谓是中国古代诗人中最具有



程千帆(1913—2000)



钱锺书(1910—1998)

现代派色彩的诗人。通过古今中外的会通,就更能彰显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价值。

王宏林 文化学视角和理论提炼都体现了您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思考。您觉得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天职是什么?

陶文鹏 古代文学研究应当立足于文学本位,我在《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中写道:“既然诗歌是心灵的音乐,我们就必须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去,探究、捕捉诗人从受到自然社会人生的刺激到灵感触发的微妙心灵律动,准确地把握诗人怎样把他的心灵律动外化为富于旋律、节奏的诗歌语言形式。既然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抒情诗是诗中之诗,既然唐代诗人们把汉语言文字的具象性、抽象性、抒情性、含蓄性、象征性、朦胧性、音乐性、跳跃性、超越性、诱惑性等奇妙性能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我们就应该呕心沥血地研究诗人们是怎样运用这种奇妙的语言文字创造出美的诗意诗境的。因此,研究唐诗艺术,固然需要文献学的功底,需要有史识、有理论概括的能力,但绝对不可以缺少诗情、诗心、诗

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书影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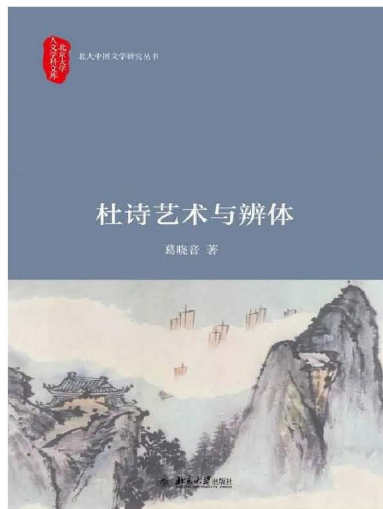
才、诗笔,不可以缺少审美的悟性、想象力和联想力,也不可缺少对诗歌语言美特别是其音乐美的敏锐感受力。”文学是人学,是人类心灵、精神的体现。时代有古今之别,心灵却能古今相通。揭示古代诗仙、诗佛、诗圣、诗豪、诗哲的崇高精神与伟大成就,给当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营养,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天职,责无旁贷。

四、欣把金针度与人

王宏林 您从1988年起一直在《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文学遗产》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最向往的学术园地,每年收到的稿件一定很多。您能否从审稿人和编辑的角度,谈谈那些未被采用的稿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陶文鹏 在《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期间,我认真研读了很多一流学术成果,深受教益。但由于版面所限,《文学遗产》每期只能刊发18篇左右的论文,大多数来稿只能忍痛割爱,不能说没被采用的文章就一定存在某些问题或者学术价值不大。就我审稿的体会而言,我心目中的优秀论文除了必须观点新颖、证据充分、论证严密之外,还应该有两个优点,其一是学术价值要大。袁行霈先生勉励北大学者“要有大志气、大眼光、大手笔、大格局、大气象”,“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事”,“不能随波逐流,不能甘于平庸,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小打小闹”(袁行霈:《〈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总序》,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卷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可谓振聋发聩之言。有些学者专门选择冷僻小问题或三四流作家来做繁琐研究,总给人以学术价值很小的感觉。其二是论文语言要雅。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论,大多写得文采斐然、富有灵气。现代和当代著

名学者梁宗岱的《诗与真》及《诗与真二集》、宗白华的《美学与意境》、朱光潜的《诗论》、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林庚的《唐诗综论》、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都是颇有理论深度的学术著作,但文字优美流畅、诗情浓郁、哲理隽永而又各具风格,读起来不仅在学术上获益,同时也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当然,学术研究论著首先应讲求理论性、科学性、创新性,但能不能在这基础上,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雅致精美一些呢?理论,是生命之树上面结出的果实,它应当是绿色的或金黄色的,光彩熠熠,赏心悦目,不应当是灰色的。



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书影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王宏林 您提倡“学术价值要大”,这使我想起您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中观研究”主张,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呢?

陶文鹏 “中观研究”是我杜撰的一个词语,是相对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而言的。它既不是指诸如论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发展规律这类极宏大的问题,也不是指针对单个中小作家和细小问题的研究,而是指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那些不大不小的课题。例如,对文学史上各

个历史阶段各种文学思潮、流派、集团、群体、风格、气象的研究,对古代各种文学体式的特征、起源、发展、嬗变、成就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对文学史上各个历史朝代中更小的文学时段的研究,对不同时段文学之间的传承、转折、变化的研究,对古代文学的家族研究、地域研究、影响研究、接受史研究、语言研究、女性文学研究,还有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与政治、经济、战争、灾荒、民族、历史、哲学、宗教、民俗、文化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文人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研究,等等。我认为,更多地发现并解决诸如此类的“中观”问题,对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很有助益。这类课题比较新颖,往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而成果规模却可小可大,既可写成单篇论文投学术刊物,又适合做成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我建议年轻学者多关心和思考这种“中观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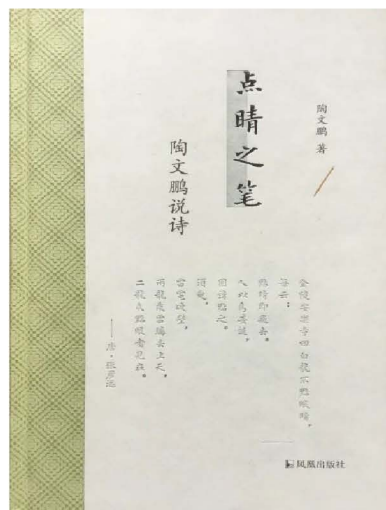
王宏林 您还提倡“论文语言要雅”,不知“雅”是否与文学创作能力有关?我知道您兼擅新旧体诗创作,是不是说古代文学研究者都要具有这种能力呢?

陶文鹏 有不少优秀学者并没有文学作品传世。不过,我认为古典诗词研究者应当学会写作诗词。近体律绝、古体诗和长短句的词都有或严或宽的形式规范,诗人带着“镣铐”跳舞,能跳出难度很大的美妙舞姿。研究者自己有了创作的经验,就能够深入细致地感受到诗人创作的良苦用心,为诗人在构思、炼字、琢句、对仗、押韵、用典、营造意象和意境等方面的独特造诣而击节赞赏,更能发现、把握与提炼经典作品的艺术奥秘。我觉得,相对于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的学者,我们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诗歌研究者的独特能力,就是在运用逻辑思维从事严谨研究的同

时,还善于运用形象思维,以诗性的智慧感受并展现诗歌的“灵境”之美。

王宏林 那我们应如何培养格律诗词写作的能力呢?

陶文鹏 我最初写白话新诗。臧克家诗翁曾住我对门,我们结为忘年交。他读过我的诗,包括前面说的《每回,上红军山》这首,赞扬我写得好,说:“你不写诗,却研究古典文学,而你是爱玩的人,更适合写诗,太可惜了。”但我在1988年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之后,就基本上不写白话新诗,而主要写近体律绝了,偶尔也被学友邀请和韵填过几首词。我写的近体律绝不算少,但好诗寥寥无几,能记起来的有七绝《太湖吟》:“鼇头渚上揽秋风,万顷澄波洗碧空。我欲化为帆一面,湖光山色漾胸中。”诗论家李元洛先生说:“初读此诗特别是第三句,真有惊艳之喜!”还有七律《题严光钓台》:“富春碧水映奇峰,峰顶双台说史踪。皋羽悲歌天柱折,子陵笑拒汉皇封。山怀浩气山雄峻,树汲甘泉树郁葱。传语四方垂钓者,请来此地沐清风!”曾获中华诗词学会优秀作品奖。我的体会是,



陶文鹏:《点晴之笔:陶文鹏说诗》书影
凤凰出版社 2019 年版

写诗要有一颗童心,还要炼出一双慧眼,善于发现大自然和社会中的诗意,然后运用新颖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精炼有韵律美的意象、语言表达出来。写近体律绝和词要掌握基本格律,可以从你最喜爱的某一位诗人入手,体会他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精熟之后再融会众家,最后做到独出己意,自成一家。当然,这需要多年坚持不懈的练习。

王宏林 您非常奖掖、提携青年后学。您辛勤治学和做编辑工作四十年,一定有很多心得体会。在访谈的最后,能否给走在古代文学研究之路上的青年学人提一些建议?

陶文鹏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常有“悔其少作”之感。许多中青年学者视野之开阔、积累之深厚、成就之巨大使我感到后生可畏,也感到自己确实是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光阴。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治学体会的话,首先是要有创新的勇气和魄力。创新是学者的使命,我们做学问,要善于发现和解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新问题,或使前人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还存在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现象与风气,譬如只愿做文献整理而不愿做理论研究,只想守住自己熟悉的领域而不愿探索未知的领域,不敢做以文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更多的人有意回避经典,造成研究经典的新成果很少。我希望更多青年学者要有知难而上的勇气和魄力。

其次是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会贯通。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各自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同时也有作为“人学”的共同精神与规律。钱锺

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序》,《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他的每一部名著,都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参照、比较、融通的杰作。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以及高远的国际学术视野,通过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乃至与宗教、文化、艺术等的比较、参照,揭示彼此的同与异,获得更优秀、更有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硕果。

最后是要不断提升审美感悟能力。只有敏锐机灵的审美感悟,才能发现新颖的题目。我的不少论题,都来自于熟读、细读诗词作品后的鲜活体验和骤然而至的灵感。这些年来,文献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许多文学研究著作引证繁富,材料准确,份量厚重,似乎颇具大家风范。但我读起来,感到只是材料的罗列和冰冷的分析,没有著者的感情、思想与温度,也没有文学性,令人难以卒读。文学研究论文要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呆板,力避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要写成讲义体、提纲体、综述体、“电脑体”。一篇好的文学论文,要像剥笋抽丝,由浅入深,层层深入,又要讲究语法修辞,使文理自然,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我觉得从事古代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研究的人,生活爱好要丰富一些,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园艺等艺术门类也要有所接触,还要培养诗词或散文、小说的写作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洞悉古人创作之甘苦与得失,揭示文学的艺术奥秘,写出无愧于钱锺书等文学研究前辈大师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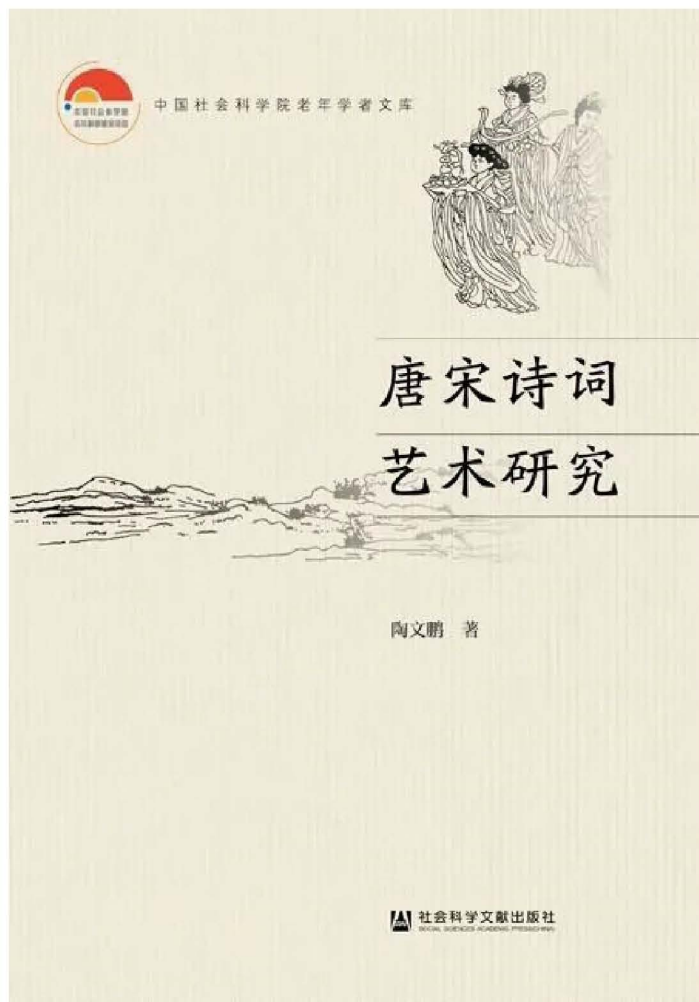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11期。王宏林,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书推介

◆《唐宋诗词艺术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陶文鹏先生所著《唐宋诗词艺术研究》一书，于 2018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对唐宋诗词文本进行细致体察，并注重视野上的会通，援引新诗发明唐宋诗艺，将诗歌与音乐、绘画、书法甚至戏剧等艺术门类联系起来观察，对诗歌艺术的特点与规律做理性的概括与提炼。在积极继

承文学研究传统的同时，借镜美学以探讨文学规律、深入开拓文本文学批评。全书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着眼于唐宋诗词的核心艺术现象，下编则围绕作家作品展开讨论。全书论题丰富，观察作品的视野亦极为开阔。《唐宋诗词艺术研究》对唐宋诗词艺术的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对于唐宋文学艺术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于2021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书是淮阴师范学院张强教授积二十余年心力,成就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运河和漕运研究著作。《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包括《先秦两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两宋卷》《元明清卷》五卷,共二百七十余万字,系统研究中国运河与漕运史,汇集了运河与漕运研究领域重大创新成果,以时

间为纵线,以运河与漕运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各方面为横线,详细论述了中国运河及漕运的起源、发展、兴盛、衰落的全过程,及其与城市、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既展现了运河的源流,也描绘出了漕运的壮阔历史。在广征博引历史文献的同时,纠正文献谬误,对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深入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和发展漕运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

